

多所顶尖高校停招学硕 学生发展机会受限了吗

■李立国

近段时间，国内多所高校调整研究生招生结构，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内的多所头部高校接连发布公告，宣布 2027 年部分专业停招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此现象并非今年独有，早在几年前，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就已宣布要停招部分学术学位硕士。对此，有人质疑这是否意味着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的路径正在收窄。

在我看来，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要放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认真分析。

研究生培养将“两条主线并行”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术型硕士调整主要集中在“双一流”高校，尤其是其中的头部高校。这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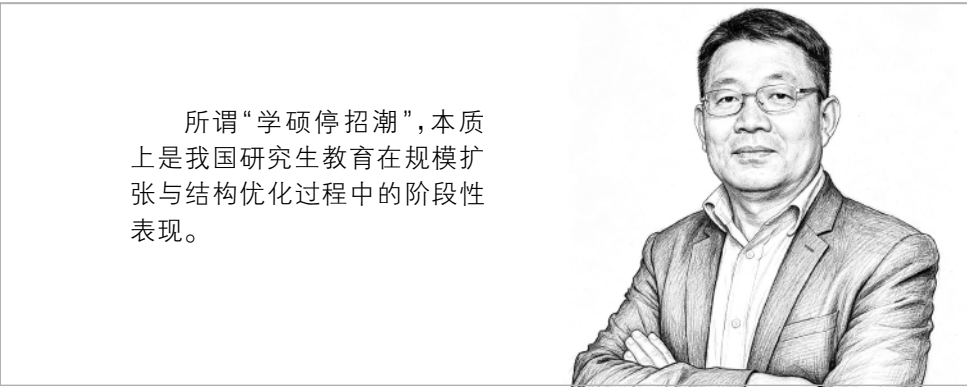
一是这些高校本科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基础相对较好，具备开展贯通式培养的条件。对于具有明确学术兴趣和研究潜力的本科生，高校可以通过本硕博一体化、本博贯通或直博等方式，使其更早进入学术训练体系，从而提升学术人才培养效率。

二是随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部分培养专业硕士的应用学科已具备了承担人才培养任务的条件，如工程、公共管理等领域，专业硕士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实践训练方面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培养模式。因此，对于某些应用属性较强的学科，学校不必再保留大量学术型硕士招生名额，而可以将资源更多投入到专业硕士培养中。

过去较长时间内，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面向学科科研体系，学术型人才培养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研究生规模的扩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学术导向已经难以支撑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当前，研究生教育正在从“以学术为中心”的单一体系，转向“学术与应用并重”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转型过程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地位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领域，专业硕士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与产业对接方面更具优势。近年来，专业硕士招生占比已超过六成，并有望进一步提升至 2/3。这意味着在硕士阶段，培养应用型、实践型高层次人才将成为主流。

同时，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心正在上移至博士阶段。学术型硕士的定位逐渐转变为“过渡性学位”，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做准备。在此背景下，本硕博贯通培养、本博直读以及硕博连读等培养模式逐



所谓“学硕停招潮”，本质上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

渐成为主流路径。这种贯通式培养既有助于更早识别和集聚具有学术潜力的学生，也提高了人才培养的效率。

从体系结构上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形成“两条主线并行”的格局——以专业硕博士为主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以学术博士为核心的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

当然，这一转型过程也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

随着专业硕士逐渐成为硕士生培养的重要主体，高校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在招生对象和培养定位方面，专业硕士应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避免形成新的教育机会壁垒。过去，部分专业学位项目强调报考者需具备一定工作经验，这可能限制应届毕业生的发展机会。专业硕士应面向更广泛的人群开放，包括应届毕业生和在职人员，让不同类型的人才都能获得继续深造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全日制专业硕士作为统招研究生，其基本权益保障问题应当被重视，包括其基本学习和生活条件要得到保障。过去，部分专业硕士培养存在学费较高情况，这可能加重学生经济负担。对此，我们需要建立更合理的收费和资助机制，在提升培养质量的同时，保障学生能够承担得起教育成本。

在学术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学术博士培养承担更多科研人才培养任务，博士生培养周期长、压力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在这方面，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博士研究生资助保障，加大奖学金支持力度，同时推动导师承担相应责任，通过科研项目等方式为博士生提供稳定的生活和科研支持。

未来仍需扩大博士人才培养规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无论是高校科研体系、基础研究领域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都需要更多高层次人才

支撑。因此，我们要继续推动学术人才培养重心向博士研究生阶段转移，同时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使不同教育阶段承担不同的人才培养任务。

从更大背景看，我国未来仍需进一步扩大博士人才的培养规模。目前，国内研究生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在读研究生人数约 400 万，使我国成为全球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但从高等教育的整体结构看，我国研究生教育占比仍然偏低，还不到 10%。相比之下，国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 20%，欧盟国家更是达到 30% 以上。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担忧，认为博士培养规模的扩大可能增加博士生的就业压力。但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博士人才并不存在总体过剩的问题。

以高校教师队伍为例，我国高校专任教师博士化水平仍然不高。根据教育部 2024 年的教育统计数据，北京高校教师博士化率约为 72.5%、上海约为 60.7%、江苏约为 43.9%、浙江约为 41.4%、天津约为 41.2%，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仍低于 40%。从国际标准来看，高水平高校教师队伍博士化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相比之下，当前国内所谓的“博士就业难”，其实更多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大量博士毕业生希望留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导致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竞争激烈；另一方面，一些地方高校、职业院校以及区域发展所需专业仍存在博士人才不足的问题。未来，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进一步优化博士人才布局，使博士人才更好服务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

构筑学位“立交桥”打破“学历天花板”

研究生教育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从单一通道向多元路径转

变。此过程的关键在于构建更开放、灵活的学位衔接机制，让不同类型人才能根据自身兴趣、能力和职业方向选择适合的发展道路。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打造卓越研究生教育，健全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分类选拔、分类培养、分类评价机制，探索“博士 + 硕士”双学位等人才培养模式，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意在构建不同学位制度之间更加开放的学位“立交桥”，以制度创新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具体而言，硕士学位并不应成为专业硕士人才发展的“天花板”。对于具有学术研究兴趣和能力的学生，应鼓励其继续攻读学术博士；对于实践能力、专业技能突出的学生，也可以探索进入专业博士培养体系。学术博士、专业博士与专业硕士之间的通道应更加开放和灵活，让不同类型的人才能根据自身特点持续发展，从而建立一个可以人尽其才的“立交桥”。

对于受到学硕招生调整影响的考生来说，学位结构变化并不意味着发展路径被切断。目前，学硕招生结构调整主要发生在“双一流”高校，这些高校过去是很多学生通过考研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目标，而随着学术人才培养更多转向本硕博贯通、直博等模式，培养效率有所提高，但也可能给部分学生带来新挑战，特别是那些希望通过考研进入高水平高校的学生，产生“发展机会受到影响”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們也需要看到，当前停招的学硕主要集中在部分应用学科，而非所有学科，学生进入高水平高校继续深造仍有多个渠道。

比如，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其他仍保留学术型硕士招生的专业和院校，或者通过攻读学术型博士的方式进入学术人才培养体系。此外，学生如果更适合实践型发展方向，也可以选择专业硕士培养路径。从制度设计看，“双一流”高校的本科直博、硕博连读等举措，也会面向所有具备资格和条件的本科生开放，学生均可报名参加考试和选拔。

不过，这也反向要求学生必须尽早明确自身兴趣与能力——如果志在从事学术研究，应尽早进入博士培养通道；如果更偏向实践与就业，专业硕士提供了更直接的路径，同时也保留了继续深造的空间。

总体来看，所谓“学硕停招潮”，本质上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这一转型如果能在质量保障、制度设计和资源配置上持续完善，将为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聘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本报见习记者侯慧静采访整理）



近期，我国学者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引发了学界与社会的广泛热议。一个老生常谈却极具现实穿透力的问题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两位获奖学者的核心研究工作均在海外科研平台完成，有观点将此现象归因于中外科研生态之间的差异——国外科研氛围更加宽松、包容，不苛求基础研究

的即时应用价值，尊重学术探索的“无用之用”；而国内科研评价更侧重落地价值，聚焦现实效用，强调科研的“有用之用”。

这一舆论争议的本质并非简单的中外科研优劣对比，而是高等教育哲学中一个百年命题的当代延伸，即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所提出的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两大哲学基础的平衡问题。高等教育认识论秉持“为知识而知识”的核心理念，认为大学的核心使命是纯粹地探索真理、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在该理念下，科研工作不应追问研究成果能否转化、能否产生经济社会效益、能否服务具体产业，而是要以好奇心为驱动，深耕抽象理论、前沿猜想等看似“无实用价值”的领域，专注于探究人类认知的未知领域。这种“无用之用”看似脱离现实、无法即时赋能社会发展，却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源头活水。

相比之下，高等教育政治论则认为高等教育并非孤立的学术象牙塔，而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工作必须回应时代命题、解决现实问题、支撑国计民生。这种“有用之用”的科研导向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产业转型升级、民生短板补齐、公共治理优化等现实需求，强调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实用价值与社会效能，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科研体系根植于国家发展需求，形成了需求导向的科研范式。在国家追赶、发展的历史阶段，此范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重大工程技术突破到民生领域技术革新，从基础产业升级到公共服务优化，具有靶向性和实用性的科研导向，使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多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与此同时，实用性价值导向也导致了当前科研生态的结构性困境——部分科研评价体系对周期长、风险高、缺乏即时应用前景的基础理论研究包容度相对不足。不少研究者迫于考核压力而倾向选择短平快的实用性研究方向。这也是部分顶尖基础学科人才选择在海外平台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

立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语境，我们无需否定我国科研体系的独特优势，也无需回避当前科研生态存在的问题，更不必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当下，国内高等教育科研的核心发展路径既要坚守服务国家、社会和民生的初心，强化“有用之用”的核心效能；也要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厚植“无用之用”的创新土壤；还要推动两者的双向赋能，构建兼具知识温度与时代担当的现代化科研生态，实现两种价值的动态平衡。

首先，优化科研评价体系，建立分类评价、多元赋能的价值标尺。对于聚焦国计民生、关键技术攻关的应用研究，继续坚持实用导向、成果导向、价值导向。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冷门学科研究，则应摒弃短期量化考核，延长评价周期，弱化实用指标，以原创性、学术价值、知识贡献为核心评价标准，为研究的长期试错与缓慢沉淀留出空间。通过差异化评价，让投身应用攻关的研究者有担当、有回报；让坚守基础探索的研究者有舞台、有保障。

其次，重塑高等教育育人导向，培育兼具务实担当与探索精神的创新人才。高校作为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摒弃极端实用主义的育人理念，兼顾实用能力培育与创新素养涵养。在学生的科研实践中，既设置需求导向的应用型科研课题，助力学生对接现实需求、锤炼实用能力；也鼓励学生自主设立探索性课题，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最后，构建双向赋能的科研生态，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深度融合。“无用之用”的基础探索为“有用之用”的应用攻关提供理论支撑与创新源头，“有用之用”的实践探索为基础研究提供问题来源与迭代方向。我们要打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壁垒，推动二者双向联动，真正实现“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的交相辉映。

菲尔兹奖学者的科研经历为我国高教科研生态的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绝非否定当前科研体系价值的依据。新时代我国的高教科研既要扎根大地、立足国情，坚守服务国计民生的责任担当，也要包容出于好奇心的自由探索，拓展人类知识边界。唯有实现两种价值的动态平衡、双向赋能，才能构建更加成熟、更具活力、更有潜力的现代化科研生态，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与创新动力。

『无用之用』和『有用之用』需实现双向赋能

美国大学语言教师是如何与 AI 共处的

■赵硕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美国大学的语言教学课堂。从常春藤大学到美国州立大学，AI 辅助语言教学从实验室走向了大规模实践。2025 年 2 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与 OpenAI 达成 1690 万美元合作协议，向超 50 万名学生和教职工开放 ChatGPT Edu 应用，使之成为全球单一机构最大规模部署的 ChatGPT 应用，该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 AI 语言教育已进入全面推广阶段。

AI 语言教育提升了学习参与度、提供了个性化支持并推动教育公平，但 AI 的深度介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语言教师角色、教学方法和教育伦理的系统性反思。

从工具使用者到协同设计者

毫不夸张地讲，AI 正深刻改变美国大学语言教师的专业角色与日常实践。在 ChatGPT 辅助语言教学中，教师被定位为多重角色：技术层面，他们是 ChatGPT 的引导者、探索者、管理者 and 批评者；学生层面，他们是促进者、调节者、示范者和情感支持者；同事层面，他们是协作者和专家用户。在美国，教师教育项目也为职前语言教师提供了系统的 AI 素养培养，帮助他们有效整合 AI 技术。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近年发布的系列报告指出，语言教师正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体验的设计者与 AI 协作的引导者。这一转型不是技术驱动的单向进程，而是教师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根据教学需求、课程目标和学生情况，策略性地决定何时、何处以及如何引入 AI 工具。

美国耶鲁大学在其西班牙语课程中引入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导师机器人，学生通过与 AI 对话练习语言技能；教师则专注于设计互动场景和评估学生表现。当 AI 承担起基础性语言练习任务后，教师得以将更多课堂时间用于高阶思维训练和文化讨论，学生的参与度和语言产出质量也由此显著提升。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英语语言中心的实践同样具有启发性。该校教师利用

AI 生成教案、课堂活动、写作范例，以及学习目标相匹配的诊断性评估。教师不再从零开始设计每一份教学材料，而是将 AI 生成内容作为基础，再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该转变使教师的工作重心从重复性劳动转向创造性教学设计。

在教师发展层面，美国大学正加速构建系统化的 AI 素养培训体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了教师 AI 素养培养模型，通过营造实验文化来应对学术诚信、工作负荷等教师关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语言学院则推出了生成式 AI 与语言教育的未来系列研讨项目，通过阅读研讨、演讲和客座讲座等多元形式系统提升语言教师的 AI 素养。这些培训项目的核心目标不是教会教师使用某种具体工具，而是培养他们在 AI 辅助环境中保持教学主体性能力，包括识别 AI 输出的局限、评估算法可能存在的偏见，以及人机协作中作出教育伦理的专业判断。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

AI 对美国大学学生语言学习过程的深层影响集中体现在写作教学和口语训练两个领域。在写作教学中，基于大语言模型的 AI 反馈系统能自动识别学生论文中的论证结构、证据使用和逻辑连贯性，并给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针对美国大学语言教学的混合方法干预研究发现，ChatGPT 作为形成性反馈工具，对学生的学术写作技能产生了显著积极影响。通过适当的学生培训，ChatGPT 可以成为大规模写作课堂中有效的反馈工具。

与传统教师反馈相比，AI 反馈具有即时性、可重复性和低风险性特点，学生更愿意在 AI 辅助下反复修改写作文稿。更重要的是，学生在使用 AI 反馈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了评估标准，其自我评估能力也随之提升。AI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通过持续互动，帮助学生提高批判性反思能力。

然而，美国教育界的实践也发出了警示信号。有研究认为，当学生过度依赖 AI 进行

文本生成和语法纠错时，其独立语言产出能力可能出现退化。如何在 not 损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的前提下合理使用 AI，已成为美国语言教师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在口语训练领域，AI 驱动的对话系统已能模拟真实的语言交流场景。学生可与 AI 进行角色扮演、辩论和情景对话，系统能根据发音准确性、语法正确性和表达流畅度提供实时反馈。目前，美国大学多聚焦于教师如何在以口语为核心的课堂中与对话式 AI 工具协作。生成式 AI 重塑而非取代了教师的教学角色，教师采用多样化的引导策略，在保持教学权威的同时适应了情感和语境约束。这些实践大多受到教师先前经验、技术熟悉度以及参与度等的影响。美国大学相关研究将对对话式 AI 视为语言课堂中动态的、共同中介的媒介，而教师的能动性是实现有意义整合的核心。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AI 语言教育实践表明，AI 在语言教育中的应用远不止于工具层面，它正在改变语言习得的基本逻辑。当 AI 能够提供即时反馈和个性化练习时，语言学习不再受限于课堂时间和教师资源，同时也要求教师重新思考什么才是语言教学课堂中不可替代的教学内容。

美国经验对我国大学外语教师的启示

综合美国大学语言教师的人机协同实践，其经验对我国高校外语教师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从技术培训走向素养重塑。美国大学的经验表明，孤立的工具操作培训难以应对 AI 带来的深层变革。教师需要涵盖 AI 伦理意识、算法理解能力和人机协作教学设计能力的系统性素养提升。AI 语言教育素养可划分为四个领域——技术熟练度、教学兼容性、专业工作和伦理使用，AI 语言教育素养的培养应成为外语教师教育项目的核心实践。

第二，美国高校可将“AI+ 外语教学”能力纳入教师专业发展体系，通过工作坊、研

修项目和跨校合作，帮助外语教师在真实教学情境中发展人机协同能力。外语教师角色正经历革命性转变，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 AI 技术应用的参与者、引导者、协调者与管理者的多元综合体。外语教师亟须掌握人机协作、数据分析等新素养，同时警惕技术对教学自主性的影响。未来外语教学的核心目标应聚焦于培养 AI 难以替代的深度跨文化理解、高阶思维与创造性表达以及人机协作的语用策略。

第三，从“教语言”转向“教人机协同”。当 AI 能高效完成语法纠错、基础翻译等语言任务时，外语教育的核心价值应回归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表达等人类优势领域。美国大学的实践表明，成功的语言教师在 AI 时代不是回避技术，而是将 AI 定位为支持工具，同时将更多精力投入 AI 无法替代的教学环节。在 AI 辅助语言教育中，真正的智能最终应掌握在教师手中，而非系统。

第四，从个体探索走向生态构建。美国多所大学已建立“AI+ 语言教学”教师学习共同体，通过案例共享、集体反思和跨校协作加速实践优化。比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语言学院持续推出生成式 AI 与语言教育系列研修活动；美国莱斯大学通过建立教师 AI 素养培养模型营造实验文化，帮助教师应对学术诚信、工作负荷等关切。然而，美国大学的实践也提醒我们需警惕技术推进中的风险，如调查显示，超过 36% 的语言教师认为课堂中学生使用 AI 的规则不够明确。这启示我国在推进 AI 赋能语言教育时，须同步建立清晰的政策框架和伦理指南，确保技术应用不损害教育的核心价值。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欧洲大学 ICT 数字化教育发展研究”〔批准号：23YJA880084〕阶段研究成果、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数字化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UC25CGJ04〕阶段研究成果）